
西谷启治及其哲学思想^①

吴光辉*

内容提要：作为日本京都学派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西谷启治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前期的“世界史的哲学”与后期的“空”的哲学。前期的“世界史的哲学”，乃是辅翼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政治理念，强调日本必须承担起“超越西方近代”的历史使命的哲学；后者的“空”的哲学，则是为了解决“虚无”的现代社会问题，强调“通过虚无主义从而超越虚无主义”的哲学。西谷启治的哲学思想的根底，应该说具有以“超越”为主题的一贯性与以“对话”为根本的方法论，这也正是西谷哲学作为 20 世纪日本哲学之代表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。

关键词：西谷启治 世界史的哲学 空 虚无主义

一 西谷启治其人

西谷启治（1900～1990）不仅是日本京都学派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同时也是一位见证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的哲学家。

西谷启治出生于日本石川县凤至郡能登半岛。少年时期曾深受空虚与绝望之困扰，通过了解夏目漱石，西谷得以关注到“禅”的思想。通过阅读日本哲学奠基人——西田几多郎（1870～1945）的《思索与体验》，西谷得以立志从事哲学研究。1921 年，西谷投入京都大学西田几多郎门下，与高坂正显、高山岩男、铃木成高同窗，尔后并称“京都学派四天王”。西谷启治一开始就从事谢林的研究，并以谢林与柏格森的比较研究为对象而提出了毕业论文。1932 年，西谷启治被聘任到了京都大学担任教师。1937 年，经日本政府委派赴德国留学，师从海

* 作者系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。

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“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04BZX034）的成果之一。

德格尔从事尼采与艾克哈特的研究。^①两年之后，西谷启治回到日本，即开始了以宗教哲学为重点对象的哲学研究。

以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重大“历史事件”为分水岭，西谷启治的哲学思想被区分为前期的“世界史的哲学”与后期的“空”的哲学。

前期的“世界史的哲学”，以《根源的主体性哲学》（1940年）、《世界观与国家观》（1941年）、《世界史的理论》（1944年）为代表，以西田几多郎的“绝对无”的思想为底蕴，强调了日本超越西方即所谓的“近代的超克”的理念，力图为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建立提供思想论证。

后期的“空”的哲学，则是以《神与绝对无》（1948年）、《虚无主义》（1949年）为开端，以《宗教是什么》（1961年）为标志，借助“空”这一概念，强调了“通过虚无主义而超越虚无主义”的思想与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。

不可否认，西谷启治的思想重心，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到政治和从政治到哲学的外在转变，但是西谷哲学的根本——“绝对无的思想”或者说“空”的立场可以说几乎保持了一贯性。

西谷启治的《宗教是什么》一书于1982年被翻译为英文和德文，由此，西谷作为西田几多郎的“继承者”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。下面，本文就按照两个时期的立场划分，通过概述西谷哲学的思想来源与基本脉络，来简要探讨西谷哲学的时代课题与价值意义。

二 世界史的哲学

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期间，日本中央公论社先后举行了以“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”、“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”、“总力战的哲学”为主题的三次座谈会，尔后编辑为《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》一书出版。这样的三场座谈会的目的，是为了给日本所谓的“东亚共荣圈”提供思想性的论证，并尝试给予日本的战争以一个合理解释。西

^① 气多雅子「ニヒリズム超克の哲学」、藤田正勝編『京都学派の哲学』、昭和堂、2001年、268-269頁。

谷启治是这三场座谈会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
按照西谷的论述，所谓“世界史的立场”，即“近世欧罗巴将它的势力向全世界扩展，世界开始出现了一种整体性”，日本因此一直“没有完全摆脱欧美式的世界认识”。（8-422）^① 因此，日本一方面必须回归传统、回归东洋，一方面要超越欧洲的近代，实现向世界史迈进的目标。也就是立足“世界史的立场”，实现自身与世界史合而为一的生命转换，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。不仅如此，西谷还进一步提到“如果近代的欧罗巴文明（它同时也是近代的世界文明）所带来的危机，可以通过我们祖先的遗产民族精神得以克服的话，只有这个时候，日本精神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能动的契机，才会具有一种世界的意义吧。”（1-150）日本不仅要绽放自己的“日本精神”，还要成为创造世界史的一大契机，日本的“历史使命”即在于此。

正如 1942 年 7 月西谷参与的《文学界》杂志举行的“近代的超克”座谈会之标题所示，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也就在于“近代的超克”。日本需要以“日本精神”为思想武器，超越西方近代精神，创造出以自身为主体的“世界史”。对此，西谷指出：（作为）大东亚圈的日本的特殊使命……一方面要唤醒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自觉，使之转化为带有自主的能动力的民族，另一方面日本要始终保持领导者的地位。”^② 日本要“自发地、主体性地承担起建设大东亚圈的力量”，以一个“领导者的地位”来实现自身的“特殊使命”。

那么，日本是否可以避免重蹈西方“帝国主义”的覆辙呢？应该说与同属京都学派的一批座谈者有所不同，西谷并没有忽略这一问题。西谷指出，“大东亚的建设绝对不能成为一种获取殖民地的行径”，日本必须为此树立“皇道精神”、“八纮一宇”的理念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西谷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“国家生命”已经成为“世界史的血脉”^③，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，即便是过去采取的“九一八”这样的行动，

^① 西谷启治『西谷启治著作集』第 8 卷、中央公論社、1943 年、422 頁。以下引用省略，括号内为卷数和页码。

^② 高坂正顕編『世界史の立場と日本』、中央公論社、1943 年、205 頁。

^③ 河上徹太郎・竹内好『近代的超克』、松本健一「解説」、富山房、1979 年、32 頁、35 頁。

亦可以赋予它以正当化。总之，为了建设共荣圈，要将“具有优秀素质”的其他民族改造为“半日本人化”^①，以实现主体性的认同与统一。

尽管西谷不赞同国粹主义、极端国家主义的立场，且对依循这一立场来推动所谓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建设持不赞同的态度，但我们也必须对西谷加以批判，其所谓的“皇道精神”之大义掩盖不了侵略的根本事实，所谓的“改造”——通过“宗教”着手而后深入到主体性的改造——也不过是针对“非日本人”的“奴役化”、或者说日本的“臣民”的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而已。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作为历史事实展现在西谷的眼前，这一历史性事件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。对此，西谷写道“日本的历史随着战争结束而被切断了。所谓切断，就是来自于外力，完全是名副其实地被切断了。……但是，历史并非只是非连续，所谓非连续，也是一个连续的方式。……（因此）我们必须从被切断了（事实）来出发。”（4-461）这一新的出发，也就是后期西谷的以佛教思想为底蕴的“空”的哲学。

三 “空”的哲学

没有批判性的历史观念，时代就不会进步。战后西谷的哲学思想，一方面是对战争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的批判。西谷指出“法西斯主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而得以产生的，其发生的条件或者处境到了现在是否完全不再具备了，对此我认为应该进行真正意义下的批判性的考察。”也就是要“深入到法西斯主义的内部，来寻找克服法西斯主义的道路”。（4-460）另一个是针对战争的反思。西谷提到“针对过去的那场战争，（日本）就如同‘他人’的事情，仿佛自己完全没有参与，或者夸耀自己侥幸没有牵涉到一样，只是将它确认为侵略战争，难道这就是批判性的考察吗？”（4-454）不言而喻，这样的批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，而是一种“缺乏了困苦的批判”，即缺乏了自身内在的批判。

因此，只有站在被切断了历史的基点重新开始，正视这一历史所带

^① 高坂正顕編『世界史の立場と日本』、中央公論社、1943年、263頁。

来的问题，才能实现真正地、批判性的否定，历史也才会得以重新创造出来。不过，西谷之所以强调这样的双重批判，并不是放弃了战前的宗教哲学，即“绝对无的立场”，而是进一步加以深化，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尤其是通过与海德格尔共有的问题意识，从而构建起自身的宗教哲学。这一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，也就是“空”的立场。

“空”这一概念来自佛教，正如“诸法无我”、“空即是色、色即是空”的表述一样，乃是指一切存在皆依因缘而生，却不具备实体性的存在。西谷在此借助这一佛教概念，且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彼此映照而确立了它的内涵，并赋予了普遍性的特征。正如《宗教是什么》的序言所强调的，“通过我认为潜藏在了近代这一历史的情境下的问题，来挖掘人的存在的根底，同时也重新探索‘实在’（Reality）的源泉是什么，就是在这样一个意图之下才将宗教视为问题的对象”而进行考察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指出“空”这一概念并非特指佛教的立场，而是把它视为“可以映照出‘实在’或者人的本质与现实的存在来加以借用”（10-5）的立场。

那么，西谷为什么要阐述“空”的立场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指出，西谷所针对的乃是西方的“虚无”的立场。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突出了“神的死亡”的观念，一切存在皆失去了根本的根据或者意义，被放逐到了“虚无主义”的荒野之中。对此，西谷提到“我们现在称之为虚无，是指历史上的一种特定的现象的历史概念，它是在欧洲这一地方，而且是在近代这一时代的精神情境中产生的。”（8-5）不仅如此，这样的虚无“在通常已经克服了的虚无的宗教层面，或者与此同等的层次之中，也会得以再度出现”。（20-189）

针对虚无主义而突出自身的问题意识，应该说西谷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影响，但是就“空”这一概念而言，则是出自西田几多郎的“场所”这一概念。他指出“所谓空，就是我们在那一场所作为具体的人……如实地显现出来的同时，围绕我们的一切事物也如实地显现出来的一个场所。”（10-102）不仅如此，西谷还专门指出，“虚无”本身是针对“有”的否定，“空”则是针对“虚无”的否定，经过了双重否定之后，“空”的立场也就作为完全“无着”的立场而得以出现，即针对“有”的立场的绝对超越而得以出现。而且，“在绝对否定

的同时……也是一种大的肯定的立场”。(10 - 110) 也就是说, 只有到了这一“空”的立场, 我们才会真正地觉悟到自我生命的“Reality”, 事物本身也才会作为其自身“存在的自觉”(Realization) 得以实现。

“空”的立场乃是后期西谷哲学的一个归结。围绕这一宗教哲学的立场, 西谷一边通过《禅的立场》、《寒山诗》、《正法眼藏讲话》等著作进一步针对禅的立场展开哲学性的诠释, 一边围绕“空”的立场展开哲学性的自我批判, 树立了新的认识论与存在论。

不过, 必须指出, 所谓“空”的立场, 并不是指要依照“空”的立场来展开什么行动, 其本身就是一种“无立场的立场”、“绝对无的立场”^①。这样一个立场, 借助西谷的表述, 也就是“通过虚无主义从而超越虚无主义”(20 - 192) 的立场。西谷认为, 只有面对“虚无”, 穿过“虚无”, 才能真正地超越“虚无主义”。

针对西方哲学, 西田几多郎采取了与之“对决”的立场。与之不同, 学贯东西的西谷启治的哲学思想则带有了东西方哲学“对话”的深刻内涵。不仅如此, 西谷哲学带有了“接着”西方哲学来“讲述”自身的一大内涵。由此, 西谷哲学也就成为了日本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之一。那么, 它的意义究竟何在呢? 我认为, 西谷哲学之根底所贯穿的以“超越”为主题的一贯性与以“对话”为根本的方法论, 正是其作为 20 世纪的哲学之代表给我们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启示。

(责任编辑: 林 昶)

^① 堀尾孟「ニヒリズムを通してのニヒリズムの超克—西谷啓治—」、藤田正勝編『近代日本思想を学ぶ人のために』、世界思想社、1997年、304頁。